

西方国际思想大师译丛

国际关系中的思想流派

Schools of Though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preters, Issues, and Morality

[美] 肯尼思·W. 汤普森/著
Kenneth W. Thompson

梅 仁 王 羽/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世界和平与文明 中国出版社

国际关系中的思想流派

Schools of Though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dependence, Issues, and Ideology

作者 詹姆斯·H. 穆尔著
James H. Muirhead

译者 王 德 明

世界和平与文明

西方国际思想大师译丛

国际关系中的思想流派

[美] 肯尼思·W. 汤普森 著

梅仁 王羽 译

石泉 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3-211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关系中的思想流派/(美)汤普森著;梅仁,王羽译.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0

(西方国际思想大师译丛)

ISBN 7-301-06537-X

I. 国… II. ①汤… ②梅… ③王… III. 国际关系学-流派-研究-美国
IV. D8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0905 号

SCHOOLS OF THOUGH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preters, Issues, and Morality, by Kenneth W. Thompson

Copyright © 1996 by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3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国际关系中的思想流派

著作责任者: [美]肯尼思·W. 汤普森 著 梅仁 王羽 译 石泉 校

责任编辑: 耿协峰

标准书号: ISBN 7-301-06537-X/D·077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 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7

排 版 者: 北京高新特打字服务社 51736661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5.5 印张 136 千字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4.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译丛总序

国际关系学在西方的兴起和发展基本上是二战后的事,但从1939年卡尔发表《二十年危机》从而奠定国际关系学科基础之时算起也已经有六十余年之久了。在这六十余年时间里,国际关系学在西方成为一门影响广泛的学科,是与一批思想深刻、视野开阔的知识精英分不开的,正是他们奠定了国际关系学的学术地位和实践地位。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教授肯尼思·W. 汤普森从这批人物中挑选出了他认为最有影响力的18位学术领军人物,冠之以“国际思想大师”的荣衔,对他们的生平及思想历程进行了简约而准确的评述,遂有其名著《国际思想大师——20世纪主要理论家与世界危机》的诞生。该著虽然发表于1980年,但至今具有类似于一部简明国际思想“史记”一样的学术价值,为今天学习国际关系、研读国际思想的人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记载。该著在国际关系学术作品中的开创性贡献是,它不以理论流派或理论方法为分界线,而是以学术人物为核心,同时也按照他们思想的大致倾向把他们划分到四个不很严格的问题领域中进行评述。它所划分的四个问题领域是:规范思想、欧美的权力与政治观念、冷战冲突分析和世界秩序理论。该著所写思想人物大多为我国读者所熟悉,如莱因霍尔德·尼布尔、马丁·怀特、汉斯·摩根索、卡尔·多伊奇、沃尔特·李普曼、乔治·凯南、雷蒙·阿隆、昆西·赖特、阿诺德·汤因比等;但也有一些名字对我们还较为陌生,如约翰·考特尼·默里、小路易斯·哈利、约翰·赫茨、查理·德维舍。由于作者有着丰富的教学和写作经验,又与这些思

想大师中的许多人曾有私人交往,就使得该著极具可读性和可信性,既是国际关系理论初学者的入门书,又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和学生爱不释手的生动读物。

为了追溯上述这些国际思想大师们的思想渊源,汤普森教授还把视野从二战之后的岁月回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从大范围的政治思想史的领域探索当代国际思想的早期智慧,从而诞生了他的《国际思想之父——政治理论的遗产》。在这部著作里,汤普森从讨论经典政治哲学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关联性出发,简明扼要地评述了最早从柏拉图一直到19世纪末的总共16位最杰出的政治思想家,着重阐述了这些思想家的思想对当代国际理论和国际事务的重要性。在这本著作中,汤普森的意旨似乎在于:早期的经典政治思想理应是现代外交决策者们的思想源泉,借助于早期思想家的洞察,现代决策者们能够认识到,今天的多数问题,无论背景如何改变,其实质内容却持久未变,对经典著作的深入理解能够帮助他们避免外交决策的失误。这种学术史意识至今仍在影响着人们。另外,该著对于国际学术界定义国际关系学科的地位和研究领域也有其不容忽视的影响,尽管不是决定性的。当然,对于是否应当把这些政治理论传统中的思想家们称为“国际思想之父”,正如汤普森在其《国际思想大师》中对“国际思想大师”的选择一样,无疑都带有不可避免的主观性,但是,也正如美国《外交事务》杂志所评论的那样,“从战后发展国际关系学的这一代学者起,国际思想之父就一直是起积极作用的最好的老师之一”。因此,从本学科的思想源头来看,19世纪及其以前的政治理论家无疑提供了最好的思想基础。

1996年,汤普森教授又发表《国际关系中的思想流派》,通俗易懂地描述了美国较早时期的三个国际关系思想流派——芝加哥学派、耶鲁—普林斯顿学派和哈佛学派,重点在于评述这三大学术流派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的方法和理论,并评价了每个学派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的贡献,其中也包括他在《国际思想大师》

中已经评论过的人物,如尼布尔和凯南等人。另外,作者对于美国学术界中几种有影响的重要观点,尤其是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和怀疑论的相互关系进行了阐述。该作品深入而不难懂、简明而不落俗套,对于我们了解作为战后国际关系学科“重镇”的美国国际关系学术界中的理论发展,甚至整个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史都大有助益。

就在汤普森发表《国际思想大师》近二十年之后的1999年,由两位欧洲的国际关系学者——伊弗·诺伊曼和奥勒·韦弗尔组织了多位学者共同编著了一部《未来国际思想大师》。他们坦言是在承继汤普森教授在《国际思想大师》和《国际思想之父》两部著作中的写作旨趣(导论中明确宣布:“本书继承了汤普森所开创的事业”),希望为正在出现的一批国际关系思想人物立传。该著与汤普森的这两部著作的最大共同点是:都采用收集这些理论家全部著作的方式来对他们进行理论评价。在诺伊曼和韦弗尔等人看来,汤普森所写的18位国际理论家代表的毕竟是上一代的思想形象,80年代之后,伴随着国际关系学科内部论战或辩论的不断开展,该学科中也不断涌现新的理论和方法,并且新人辈出,特别地,与汤普森写作的时代不同的是,除了那些明显是在承继和发展上一代思想大师的理论传统的新人物,如文森特、沃尔兹等人之外,还崛起了一批以批判或解构以前时代国际思想为旨趣的,并有意无意地在建构新的理论研究路线的新人物,比如沃克、温特、奥鲁夫和德里安等。《未来国际思想大师》的编者虽然讨论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期间的重要辩论的性质和形势,并且也大体指出了两种相对的思想路线——理性主义流派和反思主义流派,但是他们并没有把所要讨论的人物按照这种流派划分法来加以严格归类,而是以人物为中心,在介绍他们各自的思想发展和成就的过程中,让读者去体会国际关系学科中研究路线的动态变化。当然,叙事者是难以规避开他们正在其中进行叙事的语境的,该著的编者也坦率地承认,他们在

挑选这些人物时是有倾向的,突出了“那些从崭新的角度出发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着抨击的人物”,尽管这样的一些人物“至今犹未被承认是这一领域的大师”,因此他们更想通过此书,“从最新的研究思路中推出一些更有力的大师候选人”来。另外,作为积极的叙事者,由于编者和各章的作者本人都是这门学科“之中”的人物,他们除了首先想要为读者解读这门学科,为读者提供一条他们认为是通往国际关系领域的“新颖门径”外,他们还强烈地表现出参与该学科建设的热情,那就是,企图“展示一下该领域里某些顶尖作品的多姿多彩特征,并打破那种将这些作品当作是诸多非人化的‘学派’或‘范式’的组成部分的趋势”。

汤普森的《国际思想大师》一书已经为我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广泛熟悉,而诺伊曼和韦弗尔等人的《未来国际思想大师》一书则代表了解读该学科的一种新倾向或新趋势,尚未被我国读者所充分重视。希望我们以这两本著作为核心规划出版的这套小小的译丛,能够为我国越来越多对国际关系理论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一块真正的“敲门砖”。至于说在译丛名字中冠以“西方”二字,并不意味着我们把国际关系学看作是西方的学问,学问本身不应该有这样的分野,区别只在于发展的早晚和先后。今天中国的国际关系学术界已经满怀有所建树的热情,试图在国际关系学派纷呈的交响乐中融入中国的声音、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流派,因此我们也真诚希望,“国际关系的未来”不仅属于这些在国籍上隶属于西方的思想理论家们,也属于我们这个东方文化大国的思想理论家们。当然,缔造出中国的国际思想大师,尚需要艰苦不懈的努力!

最后,有必要补充说明的是,将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和思想译介过来,是为了开拓我们的视野,他们的思想和观念与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对此还请读者注意分辨。

前 言

乍一看,出版一本政治理论和国际关系思想的著作似乎是多此一举和不合时宜。在笔者起草这篇前言的时候,新的思想方法和流派正在飞速发展,笔者了解到有一个系的一群青年学者最近准备了一个教学大纲,编写了课程范围和方法的纲要。完成了这项任务后,他们发现了不下于 19 种不同的理论和方法。显而易见,在一篇文章中或一个讲座里宣布为学术界提供一种新的理论视角足以使这种理论站得住脚。在此意义上,哲学博士们最近所做出的贡献不亚于在两千多年来争论中生存下来的那些巨著。

本书指出的发展趋势很新颖。50 年来,作为一位学者、行政管理者和教授,笔者目睹了关于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的一次又一次辩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每一次辩论的过程极其相似。例如,寻求促进国际组织的方法要追溯到国会对于国际联盟和国际制度的激烈辩论。学者们不仅追溯到维护和平的联盟设计师美国人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而且要追溯到他的先驱——和平计划的缔造者们,如伊拉斯谟(Erasmus)、埃梅里克·克鲁斯(Eméric Cruce)、苏利(the Duc de Sully)、圣·皮埃尔(the Abbé de Saint-Pierre)、彭威廉(William Penn)和边沁(Jeremy Bentham)。国际法的理论始于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接下来是维多利亚(Francisco de Vitoria)、瓦特尔(Eméric Vattel)、奥本海(Lassa Oppenheim)、布赖尔利(J. L. Brierly)、德维舍(Chares de Visscher)和昆西·赖特(Quincy Wright)。同样,关于相互依赖的经济理论和思想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科布登

(Richard Cobden)、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和最近一些当代相互依赖的理论家。至于国际政治,政治现实主义的发展和成长要追溯到奥古斯丁(Augustine)、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俾斯麦(Bismarck)、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尼古拉斯·斯拜克曼(Nicholas Spykman)、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路易斯·哈利(Louis Halle)、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和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

把国际关系研究新手们最近提出的观点等同于那些其著作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大师们的思想,从表面上看就值得怀疑。它表明持此看法的人们某种程度上幼稚、缺乏严肃性和对学术史的无知。它导致了人们对理论的不信任,而理论作为一种严格要求的活动,是要经过具体的发展阶段和集中的评论和批判过程的。如果明天我就断言冷战后时代民族国家不再需要注意国家安全,那么我就不值得受到像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汉斯·摩根索和尼古拉斯·斯拜克曼一样的关注。

由于缺乏认识国际关系理论的学术鉴别力,这门学科有走入歧途的危险。漫无目的和随意的实验、对新奇东西的迷恋使它受到伤害。最新的时尚占主导地位,而历史的和传统的方法被推到了不被人注意的角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旨在扩大该领域影响的努力到头来适得其反。对话具有通天塔(the Tower of Babel)的特点,专家们相互之间不能对话,也读不懂对方的学术期刊。一小撮人曾一度把持这一研究领域,有时控制了编辑的偏好和杂志的创办方针。他们不可避免地遭到人们的反对,又一群人取而代之。学术成就屈从于多数人投票的结果,但根基不牢,成功转瞬即逝。这些理论短命、盲目的特点就是草率急就的结果。它们来匆匆、去匆匆,对知识的进步贡献了了。

笔者在本书中探讨了比前面提到的19种理论更有生命力的思想流派和研究方法。这些传统的方法构成了具有经验和逻辑

有效性的一致思想主体。理论家和实践家共同促进了理论的发展。半个多世纪以来,严谨的思想家们对当代世界提出了许多问题,需要厘清和解释。解释某些理论的哲学和假设的观点不断加进来。笔者在本书中回顾了研究政治学和外交学的较传统方法的起源,重点是某些方法所造成的伦理问题。本书研究了当代主要思想流派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所做出的贡献。这些重要的人物既是哲学家又是专家。笔者提出,每一个学派都关心的一些问题和议题达成了共识,但还有一些仍有待于解决。最后,笔者评价了涉及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和怀疑主义的问题,看它们如何影响总统、电视、公众和联合国。

致 谢

没有人能够恰如其分地对所有对他的思想和发展做出贡献的人们表示感谢。无数挚友和因工作需要偶然共事过的同事帮助笔者形成了自己的政治、伦理和外交观。一场精彩的演讲，一次已经忘记的谈话中不经意的评论，一场博士考试中的有效参与都常常使笔者受益匪浅。不知道如何感谢对于本人努力理解国际关系给予了新的启发的人们。

一大批导师和教授的思想和见解深深印在笔者的脑海里。拙作《国际思想大师》献给了他们中的五位。他们都是笔者的大学老师，笔者是在大学里发现一位导师意味着什么的。每当笔者面对特别困难的问题时，仍然可以和他们重温学术上的亲情。

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的国际关系研究是“两巨人传”，由于没有多少纪念材料帮助人们了解这两个人对该领域所做的贡献，我在第一部分的前半部分讨论了他们两个人。没有汉斯·摩根索和昆西·赖特，我们这些二战后成长起来的学生会迷失前进的方向。是这两个人塑造了未来几代人研究国际关系的领域。

有一段时间笔者离开了学术界进入基金界工作，在政治学和外交学的理论与实践接受了火的洗礼。笔者有幸效劳于一位前罗兹学者兼大学教务长，当时他即将就任国务卿。他教笔者学会如何忍耐和为目标而奋斗，如何与难于共事的同事和执拗者打交道。对笔者来讲，他给笔者留下的印象与他在公众面前留下的印象截然不同。另外一位朋友是一位美国很有能力的神学家，他对人和政治学的理解当今无人匹敌，我在第二部分和本书的其他

地方谈到他。

最后,笔者在弗吉尼亚大学的学生和米勒中心的同事给予了笔者千载难逢的特殊机遇。没有从事过教学工作的人(现在许多的议员),不了解师生之间一学期、一学年甚至一生中培养起来的情感。看到学生不断发展的兴趣,感受到他们智慧和道德的成长,对于他们的理解做一点微薄的贡献——所有这些把师生紧紧联系在一起,这种关系是其他关系难以代替的。没有任何一份职业能让人得到如此丰厚的回报:与同事们和忠于职守的秘书和业务人员们共同去做实实在在的课题研究。

说了这么多,笔者必须向读者们提一下本书献辞(汤普森的原著是题献给他的四个孩子的。——译注)。生活就是奋斗,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人都是如此,而且生活本来就是这样。虽然身处天涯海角,但越近晚年越恋家,这是清教徒的一种涅槃,不是因为家能够带来宁静,而是因为晚年最重要的是一种平凡的生活方式。

笔者没有列出所要感谢的所有人的名字——或者说只列了一小部分——部分原因是每个人至深的快乐和友谊是个人的事,是个人独特的体验和永久的纪念。想知道笔者要感谢谁,敬请看以下的篇章。笔者没有提及自己的双亲——阿涅斯·汤普森和索尔·C. 汤普森(Agnes and Thor C. Thompson),因为笔者知道自己这一生欠他们太多,对他们顾念太少。

千言万语难以言尽笔者的行政秘书对笔者的无数次帮助,是他们使笔者每天在米勒中心工作的完成成为可能。而且,笔者要深深感谢尽心尽力服务于研究中心及份外帮助笔者的同事们——虽然这里没有提及他们的名字,但他们会知道笔者的感激之情,笔者的朋友和共事者也同样知道笔者的感激之情,我们共同使中心向着做出贡献的目标迈进。笔者还要感激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研究生和编辑,是她在工作中发挥了高超的技巧。最后笔者要感谢自己的妻子,她牺牲了我们本可以共度的时光,否则

便不可能完成这些工作。只有那些自己既是教师又是学者的人才能如此长时间忍受分离之苦。

目 录

前 言	(I)
致 谢	(V)

导 论	(1)
第一部分 思想流派	(9)
芝加哥学派	(11)
哈佛学派	(26)
耶鲁/普林斯顿学派	(31)

第二部分 国家利益和伦理：理论与实践	(39)
莱因霍尔德·尼布尔	(39)
专家与外交官	(42)
凯南和尼采关于伦理和外交政策	(49)

第三部分 问题	(71)
态度：乐观主义、实践与和平	(71)
方向：寻求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80)
哲学：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	(89)

第四部分 尚未解决的问题	(110)
系统思想还是体系理论	(110)
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和怀疑主义	(145)

后 记	(158)
-----------	-------

导 论

在某种意义上,本书是对学术史的一次探索,目的是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一种视角:它的起源、演变、发展和现状。回顾它一开始是什么模样?创立者是谁?导致连续性和变化性的因素是什么?有没有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永恒和一致的思想呢?谁是写出这些不朽名著的解读者?

任何领域或学科,每一阶段提出的问题以及提出问题的方法都是该阶段所关注的基本问题的标志。它们有助于我们划分该学科发展的历程,解释它是如何达到今天这种状态的。立场对立的代表人物之间经常进行的“大辩论”在解释各种方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下面篇章里,我们着手收集了经验和逻辑方面的证据来描述和评价重要的思想流派。

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观察家和学者们问道,国际关系研究是不是一门得到承认的学科?它有始终不变的核心吗?它是不是建立在某种增进知识的学科的基础上?它解决了某些基本的、反复出现的定义性问题吗?经济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有这么一个核心,政治学也有这么一个核心。弗里德里克·邓恩(Frederick Dunn),从耶鲁迁往普林斯顿那群倒戈者的领头人,认为国际关系应该研究二十多个不同学科。昆西·赖特在他的不朽名著《战争研究》中寻求与从农业到动物学领域专家的合作。他讲授的研究生课程涉及从社会道德沦丧到惧外等社会发展趋势。国际关系涉及的主题领域宽,具有交叉学科的特点。但很少有人将其称为一门学科。

后来,赖特和其他人继续探讨对立的定义和统一的主题。他们把社团和社会作为尽可能统一的概念加以研究,并把技术和工